曹动之：忠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曹青天”

曹动之（1906年—1950年），原名曹开诚，陕西省横山县人。1949年8月，参加解放宁夏战役。1950年4月，改任阿拉善旗工委书记兼保安总队政委。当时，贺兰山土匪郭永胜到处骚扰。7月间，曹动之出席宁夏第一次党代会结束返回，随带警卫杨万山、张永祥，行至樊家营子哨所，不慎进入郭匪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壮志青年投身革命

1906年，曹动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本县毛乌素小学读书，1920年，在横山县立高小上学。1921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后，曹动之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于1925年在横山县高小同鲁贲、高岗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一起发动了数百名学生参加的罢课，史称“一高学潮”。

在学潮中，学生们开展反对当局专制压迫，反对旧学制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声援下，迫使当局撤换了专制独裁的县长和校长，学潮取得了胜利。为此，反动当局借故开除了曹动之等人的学籍。随后，他来到靖边县镇静小学读完高小，考入榆林直属中学。

1926年，在榆林中学因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下令再次开除学籍，武装押出榆林城，后遣送回横山县老家务农，不准外出。

1927年，横山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钱达民介绍曹动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中共横山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鲁贲调离横山县，曹动之接任了特支书记。这期间，他以教师身份，一面宣传革命真理，一面秘密组建游击队。当年年底，在西沟村创建了几十人，数十支枪的游击队伍。

1928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曹动之领导这支游击队，在西沟村一带打富济贫，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扩大游击队武装。

1929年，曹动之率领游击队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开展活动，伏击了该旗的反动武装十二团，开辟了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此时，曹动之家由横山县迁往靖边县的大石砭，紧靠乌审旗的边界，为他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0年至1931年，曹动之奉党组织的指示，打入国民党驻靖边县柠条梁高世雄骑兵团，做兵运工作。在该部争取并组织了一个连的兵暴。暴动后，将一部分人组成蒙古骑兵游击队，活动在伊盟地区。

英勇善战领导革命

1934年，曹动之领导的游击队正式编入陕北工农红军二十二支队，被任命为支队长兼政委，活动在乌审旗、城川及与三边交界地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1935年春，曹动之和吴亚雄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任队长。他率领这支民族骑兵队，驰骋在长城内外，绥蒙草原，勇敢战斗，屡建战功。8月，率队攻打横山。9月，解放了杜新庄。10月，又打下了黑峰子，受到上级通报表扬。在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曹动之率先献出家产，购枪买马，建设部队。

1936年，党中央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县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曹动之、赵统儒也参与领导工作，开展了蒙古族地区的抗日运动。在此期间，曹动之与弟弟曹布诚以牧马人的身份作掩护，深入到乌审旗乌拉尔林一带，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们走乡串户，深入到牧民的帐篷里，建立感情，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为，建立党的秘密联络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曹动之先后担任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兼骑兵营长、团长和中共伊盟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长等职，从事抗日统战和建立民族革命武装的活动。1941年，城川二次解放后，曹动之任城川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曾多次奉命组建蒙汉骑兵游击队，给主力军输送干部、战士，并协助在敌方与我方有关系的齐金山、王悦丰等策动了西乌审部队的起义。还带领齐金山、杨玉清、石宝山等起义首领到延安参观学习，齐金山成为蒙古爱国人士及我党益友。曹动之在蒙古地区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的大汉族主义，使蒙古人民逐渐对我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曹动之也深得蒙古族人民的拥护和信赖，称他为“曹青天”。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曹动之带领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骑兵团，参加了保卫边区、扫荡北线外围的战役，先后解放了镇川堡、响水堡、波罗镇，又围攻了横山县城。为了争取国民党驻横山守军王永清、段保山的起义，他同地方干部李坤润冒着生命危险，进城与敌军谈判，促使横山县和平解放。

1947年3月，蒋介石以几十万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宁夏马鸿逵也调兵遣将，进犯三边分区。此时，曹动之被任命为三边东线作战副指挥，率领蒙古骑兵支队各游击队，堵击了蒙古叛匪的南犯，保卫了三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8年，曹动之调任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8月，被组织派往乌审旗与旗王奇玉山谈判，争取了东乌审旗的和平解放。

贺兰山下埋忠魂

1949年8月，曹动之率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参加解放宁夏的战役。9月23日宁夏和平解放。10月，在原三边军分区的基础上组建了宁夏省军区。1950年4月，曹动之被调到刚解放不久的阿拉善旗任工委书记，兼保安司令。

当时，盘踞在贺兰山的土匪郭永胜（乳名郭栓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后不久即撕毁协议，公开叛变，抢劫民财，扰害群众，为非作歹，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扬言要攻打阿拉善旗工委所在地定远营。此时，社会秩序混乱。7月中旬，曹动之来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仍关心着阿拉善旗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利用开会间隙返回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布置工作，后又赶回银川，听取省委传达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刚结束，他于7月30日由银川乘马动身，翻越贺兰山回阿拉善旗，不幸于31日8时许在樊家营子遭遇郭匪袭击，曹动之当即抛开马匹、行李，藏好机密文件后和通讯员中共党员杨万山、张永祥一起，同匪徒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杨万山、张永祥中弹牺牲，曹动之也光荣殉难，时年44岁。

为了彻底消灭郭栓子匪部，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贺兰山，围剿郭栓子，终将他拿下。宁夏政府在银川召开公审大会，银川人民愤怒声讨郭栓子的残暴罪行。随后，郭栓子被执行枪决。

曹动之遇难后，宁夏各族人民在银川召开了公祭烈士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宁夏省委、省政府对曹动之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牺牲，模范未来”。中共宁夏省委、省政府的挽联写道：“为人民事业牺牲其功其德永垂不朽”。 （据银川党史网）

宁夏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和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抗击，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爆发。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日的决心。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9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抗日的讲话，并同意将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派出适当人员同各界广泛接洽，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银川的形势

1937年，宁夏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毗邻，宁夏如果沦陷，陕甘宁边区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宁夏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接触，做争取马鸿逵的工作。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家伦等人多次与马鸿逵部的人员交往。一些进步知名人士范长江、黄炎培等也都与马鸿逵有所接触，目的在于促使其以民族大局为重，积极抗日。时年随着陕甘宁边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有力地影响了西北地区的抗日形势，也影响了马鸿逵，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进一步坚定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

宁夏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日本自占领东北后，一直积极培植汉奸势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的同时，把注意力也转移到宁夏，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

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日军特务活动十分猖獗。设在伊克昭盟庞大的特务机构，担负着对宁夏的侦察任务，经常派遣特务人员潜入宁夏进行活动。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马鸿逵派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前往，并明确提出不许日本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坂垣不接受宁夏方面的意见，还是派4名特务到宁夏省城四处活动。8月，日本在宁夏省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音浩特镇）建立驯马场、军用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日本多次派飞机到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进行侦查，装卸军用物资，还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省城进行实地侦察，测绘地图，拍照险隘，搜集地情资料。

1937年10月，日本侵占包头后，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伪督办。数日后，日本又向宁夏省城空投“伪满洲国”信件，再次进行劝降，也未奏效。日本连续引诱、劝降失利，恼羞成怒，遂于1937年11月至1939年9月，先后3次出动50余架次飞机对宁夏省城进行轰炸，炸死炸伤居民1000余人，炸毁房舍1000余栋。

1938年2月，日本出版了由日本情报机关人员冈部休善编印的《宁夏省事情》一书。该书内容涉及宁夏省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疆域土地、人口、物产、工商业、财政、金融、风俗、民生、教育、交通、水利、盐务等诸多方面。该书的出版，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绥远，窥探宁夏，为其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西北地区所作的情报收集工作之一。

1937年冬季，日军逐渐加紧对绥西、宁夏进攻的准备。马鸿逵提出了“发动民族，组织群众”的口号，“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势力。”并加强了宁夏北部黄河沿岸的防御工作：分4期在石嘴山、尾闸一带修筑国防工事，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树枝、麦草、浮土等，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的通过；在磴口（三盛公）以北100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将黄河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以备阻击来犯日军。

1938年5月，绥远防务空虚，大部分地区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中央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统一指挥绥西各部队。马鸿宾率八十一军和马鸿逵部骑兵一旅（旅长马光宗）、骑兵二旅（旅长马义忠）开赴五原、临河抗日前线，直接对日作战。马鸿宾将其主力三十五师分布于乌布狼山各要隘，担任抵抗日军第一线的防守任务。以马鸿逵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作为三十五师之后续力量布防于五原至狼山一线。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板垣师团一部，配以汽车、装甲车、坦克，由包头向绥西进犯。日军进至三十五师阵地前，以猛烈炮火轰击马部，步兵则在炮火掩护下冲向阵地。八十一军参谋长马惇靖（马鸿宾三子）亲临乌达镇前线指挥，利用地形向日军侧背迂回出击。日军遭到有力打击，被迫向后撤退。此次战役，缴获日军汽车两辆及部分武器弹药。马鸿宾部绥西抗敌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士气、民心。

1940年1月30日，日军驻伪蒙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纠集机械化第二十六师团以及德王、李守信、王英伪蒙军6个师共4万余人，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重炮、各种毒气弹和1000余辆汽车，兵分3路向绥西进攻，企图将国民党绥西抗战部队围歼于五原地区。2月1日早，日军兵分两路向马鸿宾部和门炳岳骑兵第七师阵地进攻。马鸿宾部士兵奋起还击，连连打退敌人进攻，双方激战数日，伤亡甚多。某夜11时，马鸿宾部一团阵地被突破。次日，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派兵增援，再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至下午，日军突破马鸿宾部右侧。马鸿宾部向后撤退，遭日军地面部队追击和飞机扫射，伤亡极重，被迫转入沙漠地区。当时，在重庆开会的马鸿宾闻悉军事失利的消息后，立即飞抵磴口，组织抢救伤员，重整部队，令三十五师一〇四旅旅长马培清率部重返绥西前线作战，收复失地。2月20日夜，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及宁夏三十五师等部向日军发起反攻，经过两天激战，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水川及日伪军数千人，收复临河、五原。

这次战役，对保障宁夏、甘肃和陕北后方安全起到巨大的作用。战斗中，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牺牲1000余人，伤2000余人，其中冻伤者就达700余人。宁夏数千名抗日将士为了捍卫民族利益，英勇战斗，血染绥西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人民的广泛赞扬。这是宁夏抗战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中共中央派张子华到银川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省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乘飞机抵达宁夏省城，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谋求合作抗日，并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方被俘人员及解决边界划分等有关问题。

张子华到宁夏省城后，在谈判中向马鸿逵通报了1936年豫（同心县）环（县）民团赵老五偷袭环县民主政府，将红军干部朱子休等7人抓至宁夏省城关押和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被俘的情况。马鸿逵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答应“很快放人”。事后，经多次交涉，马鸿逵释放了朱子休、吴士芳等7位我方被俘人员。

张子华在谈判中提出：“主席先生一再表示愿与我党修好，合作抗日，可否在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日后联系。”马鸿逵推诿说：“此事关系极大，本主席难以做主，须请示中央政府定夺。”张子华又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马鸿逵推脱说：“此事后议！”张子华还提出解决边界、开放民主、动员民众抗战等问题，马鸿逵对此只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张子华在宁夏省城期间，虽未全部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但却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与宁夏潘钟林、吴元珲、高立天、温宝玺、张致和、苏印泉等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嘱咐他们多做有利于抗战的事。张子华还秘密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袁金章、高立天等人，成立了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为建立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条件。还动员王振刚（王茜）、王栋、张致善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张子华离开宁夏省城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见到曾在北平一起搞过学生运动的宁夏人阎廷栋。阎请张子华介绍他去延安。张子华说：“宁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尚未开展起来，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还是回宁夏帮助我们做好掩护工作，这很重要。”阎廷栋按照张子华的吩咐，回到宁夏省城，在宁夏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为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据银川党史网）

三军会师将台堡 宁夏红旗漫卷

将台堡，因为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而被载入史册。

宁夏进入红军视野，并被频繁提到是在“两河口会议”上。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在四川省懋功北部的两河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认为，红军向南、向东、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陕、甘方向发展。毛泽东在发言中阐述了选择北进的理由。他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中央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张国焘问是什么时候？张闻天说，大约在10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毛泽东继续发言说，宁夏是富裕地区，敌人在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两河口”会议统一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到达宁夏回民聚居区的首支红军部队是红二十五军。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切断了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8月15日3000多名红军进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等地暂作休整。

红军在驻地不仅张贴《告回族人民书》和“红军和回族同胞是一家”“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标语，宣传教育群众，而且还把驻地院子和街头巷尾都打扫干净。红军医生也热情地给回族群众送医送药、治疗疾病。红军医院院长钱信忠还亲自为一腹胀患者扎针治病。让回族群众难忘的是，8月16日中午，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带领红军，抬着一块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八个大字的锦匾，带着6个大元宝，牵着6只大肥羊，去拜访清真寺的阿訇。很快，阿訇也领着回族群众带上礼品，赶着肥羊，前往红二十五军军部进行隆重的回拜。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领导人率领陕甘支队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西吉回民聚居区。

回族群众对红军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敬意。“这种群众热情是红军出藏民区以来的第一次。”据童小鹏、徐国珍、成仿吾等老红军回忆，到达固原回民区域，回民沿途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拥挤地来看，入宿营地时更表现出回民对红军亲热的欢迎，帮烧水、购物，把窑洞腾出来给红军住。当地回民生活贫困，但还主动帮助红军部分筹粮，甚至把自家仅有的一升米也送给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固原五天四夜时间，其他红军部队自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在宁夏活动，共有1170余名回汉青年参加红军，留下了一系列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和雄壮激荡的革命史诗。毛泽东据此经历写出了著名词篇《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后，如何解决大军吃饭问题，也曾论及宁夏。

1936年8月25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间一份探讨中国红军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电报，也同样论证了宁夏在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地位。这份电报说：“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收藏一张泛黄的地图上描绘着红军行进的路线。1936年10月21日，贺龙在西吉县平峰镇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红一、二、四方面军历经两年多艰难困苦，浴血奋战，胜利会师，标志着伟大而艰巨的红军长征顺利结束。1996年中央文件明确，1936年10月22日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日。 （据《中国青年报》）

陕甘宁边区如何组织动员妇女参加劳动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受战争影响，边区青壮年男子劳动力不足，又增加了破局的难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从发展经济和解放妇女的双重目的出发，积极组织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使广大妇女以饱满的热情挑起边区经济建设的大梁。

宣传妇女劳动光荣。边区政府自1939年起先后发布婚姻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和规定，推动婚姻自由、夫妻平等以及妇女放足。妇女干部们在集会、庙会等场景张贴标语、传唱民谣，深入到各家各户，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给妇女讲解参加生产的好处和妇女解放的道理。边区举办的“妇女生产展览会”更是让妇女们对自身的生产才干感到骄傲。

表彰妇女劳动英雄。边区以树立榜样的方式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300多名妇女劳动英雄被分批评选出来，其中马杏儿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马杏儿本是与父母一起逃荒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父亲马丕恩与当地农场签约租下土地并借来耕牛和工具，15岁的马杏儿不顾母亲反对决定随父亲一起下地劳动。农场职工开展开荒竞赛时，马杏儿每天能开1.8亩地，最快时达到2.5亩，不亚于身强体壮的男青年。通过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马家的收成明显超过其他农户，第二年就实现了“耕一余二”（一年劳动两年余粮），成为周围村镇勤劳致富的榜样。1943年边区嘉奖马氏父女为劳动英雄，特别表彰马杏儿不仅为家庭作出贡献而且通过劳动“从经济上造成独立的人格”。此后，边区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杏儿的热潮。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以马杏儿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该剧以“生产不分男女”为主题，引领了边区的时代风气。

推动妇女纺织运动。1943年三八节之后，依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进一步推动妇女纺织运动。政府采购新式手工纺织机发给各纺织家庭，银行发放专门的纺织贷款以支持民间纺织作坊。妇女工作者们背着纺车和棉花深入农村、山区开办纺织训练班。妇女组织还指导纺妇生产采取纺织小组、纺织编工队、纺织合作社等多种集体化组织方式，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到1944年，边区已有纺妇152645人，织妇60548人，纺纱166万余斤，织成大布114497匹。

加强妇女权益保护。在工业领域，为了鼓励女工，边区的公营工厂全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并先后引入计件制、职工持股制，保证女工与男工一样有劳有得、多劳多得、参与分红。在此基础上，工厂对女工尤其是孕产期女工实行贴心的特殊照顾政策，并为她们提供受教育机会。在农业领域，按照1946年后土地改革运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边区在土改中执行“在以家庭为单位发土地证件时，须在土地证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必要时还可单独另发土地证给妇女。农村妇女分到了土地，就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为她们继续积极从事劳动生产吃下了“定心丸”。 （据《学习时报》）